

“变法大纲”中的货币设计*

——《盛世危言》“铸银”篇探析

王五一

摘要：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专辟“铸银”一篇，探讨中国的货币独立和统一问题。在全面之利弊分析的基础上，“铸银”篇提出了中国应自铸银币的主张，并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政策规划与体制设计，从而对晚清中国追求货币统一与独立的艰难努力，起到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和舆论推动作用。

关键词：郑观应 《盛世危言》；晚清货币；白银；银元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12-0134-11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16.12.014

作者简介：王五一，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教授

郑观应并不是清末变法运动的头面人物，但他写的《盛世危言》一书，却被时人和后人誉为“变法大纲”^①。如张之洞所赞之者，“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②。在《盛世危言》思路宽广、跨度宏大、“统筹全局”的设计体系中，货币改革问题，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郑观应重视货币，大概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者，货币制度的建设是中国近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在“变法大纲”中自应给予相当的位置；二者，即使没有宏观整体上的变法大计，仅就当时国家的货币困境而言，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也已成燃眉之急，必须予以正视、设法解决了。

晚清中国的货币体系之混乱状态，综合而论，突出地表现为两点：第一，本币外币共通，货币不独立，形成国家利益的“绝大漏卮”；第二，钱银钞金芜杂，货币不统一，导致市民经济的“隐受其亏”。郑氏于《盛世危言》中专设“铸银”一篇对此加以专论，其所批评者，所欲设法解决者，乃是“不独立，不统一”两大弊端。“铸银”篇之要点，一言以蔽之，欲以“中国自铸银币”之一策而收并除此两弊之共效——铸造统一之国币，“成色一律”，“一体通行”以一币代百币，实现全国的货币统一；以中国自铸之银元，取代在中国市场上已成“喧宾夺主”之势的外国银元及其它外国货币，实现中国的货币独立。

一、芜杂的货币种类，混乱的货币格局

如戴建兵所述“近代中国的货币，种类极为复杂，在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有：银两、银元（自

收稿日期：2016-04-06

* 本文系澳门理工学院研究资助项目“郑观应财经思想研究”（项目编号：RP/OTHER-02/2014）的阶段性成果。

① “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蔡元培《杂记》手稿，载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页。

② 张之洞《盛世危言增补统编·序》。

铸和外国银元两大类)、制钱、铜元、银行券、私票等等。时人多认为近代中国货币‘芜杂紊乱’，是‘最复杂的一种’。”^①

面对如此之“芜杂紊乱”，以致于今人在着眼回顾它时，需要先把彼时的货币称呼作一概念交待，如“钱、银、钞”三字，今天看来字面上差不多是同义词，都是“货币”的意思，而在那个时代，此三字摆在一起却分别指代三种不同的货币型制。钱，是指铸币，又叫制钱，在中国货币史上主要是指铜钱；银，则是指银两，银块，在交易中以“成色×重量”来计值；钞，则是指纸币。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亦在此含义上使用它们，所以我们在展开对郑观应铸银思想的研读时，需要先做此概念上的清理，以利进一步说话。

“钱”，是中国货币史上使用最多的型制；根据货币学家彭信威的考证，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钱”（金属铸币）的民族^②。钱的全称为“制钱”，其“制”字，应当是既有“制造”也有“制度”的意思，即是说，制钱，一般是由政府统一制造的、有一定规制的金属铸币^③。

“银”，是以其金属材料的天然价值为基础，以其材料的重量为计值单位的货币型制。可以充当原金属货币的金属材料，几千年世界货币史的实践证明，主要是黄金和白银^④。铜、铁一类贱金属的成色驳杂且笨重不便携带，又难以鉴察成色重量，更不利长久保藏，故而无法为市场接受为原金属货币。铜铁不适合做原金属货币的材料，却适合做金属铸币的材料。在中国货币史上，制钱多是铜制的，也有少数铁制的甚至铅制的。

制钱有“面值”，在使用时无须过秤，只须点数。“凭重量交易”或是“凭个数交易”，这是原金属货币与制钱的本质区别。并不是任何经过铸造的货币都会自动地获得“凭个数交易”的市场地位，取得了此地位的铸币，定是因为在该类铸币的制造、发行或使用中，掺入了信用的成份。清代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之所以起初只是以银块的身份流通，是因为其时该种货币对于中国市场而言尚未蕴含有任何信用成份在其中；而它之所以后来逐渐取得了凭个数流通的市场地位，是因为，这种货币在其长期的流通使用中自己为自己创造了信誉和信用。理解这一点，在货币理论上极为重要，对于理解郑观应货币思想，尤为重要。

钞，即纸币，其本身没有价值，纯粹的信用货币。从宋代发行的“交子”、“会子”，到郑观应时代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各类钞票以及华人钱庄票号发行的“私票”，中国已有了千年纸币史。钱与钞，都是人造货币，都有“信用”的成份参与其中，不同的是，制钱中所包含着的信用成份是辅助性的，辅助到使其可以“按个数流通”即达目的，其价值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由以制造它的金属材料的价值；而钞票之成为一种可以为市场接受的货币，则完全是由于信用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钱是一种介于原金属货币与纯信用货币之间的币种^⑤。

郑观应铸银思想中所关注的货币种类，并不是“钱银钞”，而是在其之外的第四种货币型制，银币。前述对“钱银钞”的交待，只是为讨论郑观应铸银思想，奠定一个知识上的基础。郑观应之所以主张中国应自铸银币，是他从当时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外国银币身上，看到了银铸

① 戴建兵《中国近代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1890-1935）》，《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② “西方最早的钱币，是公元前第七、八世纪时小亚细亚的里底亚（Lydia）所发行的。这是中国周定王的时候，当时中国已经有钱币了。”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③ 制钱既是官制的，则它就会像今天的纸币一样，有民间造假的可能。在中国古代，铜钱造假一般是指“私铸”。私铸的铜钱，钱是假的铜是真的。故而，与今日对待假纸币的态度不同，彼之市场乃至政府对待此类“假钱”的容忍度很高。在多数情况下，私铸的铜钱也可以当真钱用，或在一定折扣上（市场知道如何折扣）当真钱用。当然，为了维护国家的铸币权和货币统一，有些朝代的朝廷也会对私铸给以严厉打击。“在封建统治的横征暴敛之下，许多善良的老百姓也被迫从事私铸。汉武帝时犯私铸罪判死刑的有几十万人，参加私铸的有几百万人。唐乾元二年单是长安城中因盗铸铜像和钟来铸钱而被打死的，就有八百多人。”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1页。

④ “黄金在中国，从来没有正式货币化，但也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它在各时代担任了各种不同的货币职能。而宝藏手段的职能和国际支付手段的职能，是在任何时代都具备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18页。

⑤ “中国铜钱的性质，从它的购买力的变动一点上来看，是介于金银币和不兑现的纸币之间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9页。

币——与传统的制钱和银两相较——在实际使用上的诸般益处。

银币，既可以看作是“钱”——因为它也是一种铸币；也可以看作是“银”——因为它是银造的。或者反过来说，既不能把它看作是“钱”——因为在中国的术语体系中，“钱”一般专指铜钱；也不能将之看作是“银”——因为在中国的术语体系中，“银”是专指银两。所以，我们把银币看作是“钱银钞”之外的第四种货币型制。这第四种货币在概念上又可以再分：当时的人们一般把由外国进口的银币称为“洋钱”，而把中国自铸的银币称为“银圆”。

有了对上述各种货币型制的基本概念认识，就可以进一步地来理解晚清中国货币体系之芜杂混乱的格局了。

1. 银两与制钱并行

“清朝的币制，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①在清代的货币万花筒中，银与钱始终是最主要的两种^②。今天的中国人，从那些外行的影视作品中获得了一种印象，以为白银是中国古代自始至终挑大梁的货币种类，其实，中国自古贫银，故而几千年来中国货币很少用银，按彭信威的说法，“战国秦汉，勉强可以说是金、钱平行本位，六朝隋唐是钱、帛平行本位，宋金元至明初是一种钱、钞流通制度，明中叶到清末是银钱平行本位”^③。这就是说，只是到了明中叶，白银才正经成为中国货币舞台上的主角。

这其中重要的历史原因。明中叶，更确切地说是16世纪后半叶，世界及中国先后发生了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第一件，西班牙在美洲发现并开始大规模开采白银，急于在世界上寻找市场；第二件，明隆庆初年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贸易，从而打破了朝贡贸易的垄断；第三件，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的改革，国家财政体系的货币轴心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三件事之间的逻辑联系，由一条“银线”串起来：

中国本缺银，现在好了，国际市场上有“卖”的了，这是第一件事的意义。

开放海禁，打开大门，以自己传统的瓷器、茶叶、丝绸等产品到国际市场上把白银“买”进来，解决中国的货币短缺问题——明朝历史上，无论是明初的海禁还是隆庆年的开禁，其主要目的都与货币有关。“本来中国的闭关政策，基本动因乃是货币的保存。”^④为了防止货币在海洋贸易中外流，所以实行海禁；同理，为了从海洋贸易中赚取更多的货币，隆庆皇帝改变了政策，开放了这一禁了多年、禁不胜禁、不必再禁的海禁。这是第二件事的意义。

随着大批的美洲白银经菲律宾转口而流入中国，中国市场上白银的数量剧增，因货币短缺而崩紧了的各种社会问题均得到了缓解，同时，也为张居正这位著名的“改革家”，带来了巨大的套利取名的机会。“赋役皆用银”的“一条鞭法”改革，“朝野上下率用银”^⑤的皇帝诏谕——外来的白银透过此一改革所开辟的渠道而迅速地融入了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机体在此一新鲜血液的激励下取得了活力，也从此走上了依赖外来货币输血的道路。这是第三件事的意义。

始自中明的白银进口，把中国的货币体系拖下了水，使得整个中国经济从此染上了“银癮”，产生了对国际白银市场的依赖。中国不产银却用银，当时的中国人并未理解到这其中的危险，直到明王朝的大船终被世界白银市场上的波涛所倾覆^⑥，人们对此一危险性才有所感觉。

白银进口也为清代的货币体系留下了一个重要的遗产——银钱并行。白银的充斥以及由此形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37页。

② 大数用银，小数用钱，这是事实，但若据此便将银钱说成是平行的两种本位货币，则不确切。说到本位货币，总有一个“法定”概念在其中，而钱银的这种主流地位的取得，却是纯粹市场自发力作用的结果。

③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0页。

④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页。

⑤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⑥ “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急速下降直接造成的。”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133页。

成的对白银的瘾性依赖，并没有把制钱驱逐掉，毕竟，中国已有了三千年的用钱史，人们在感觉上更相信“钱”是钱。满清入主中原伊始，似乎是接受了明代银祸的教训，对制钱的铸造与使用，极为重视与严肃^①，从而多多少少淡化了晚明“赋役皆用银”的政策，形成了“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之平行本位的格局。然而，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对外收付交易的增加，“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之格局，逐渐地具有了独特的新内容。由于国际支付皆是“大数”，且与列强打交道，容不得含糊，须付以实银，“大数用银”便悄然具有了“对外用银”的含义。而由于“小数”交易多发生在国内经济活动中，故而“小数用钱”便自然具有了“对内用钱”的含义。也就是说，“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中包含着“对外用银，对内用钱”一层意思。

进而，随着满清财政的日益拮据，通货膨胀政策开始被朝廷用来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通货膨胀政策无法在银两上而只能在制钱上作手脚，因为制钱中原本就有政府信用的成份隐含其中，政府对此一信用成份进行灌水，顺势顺手。实际上，信用灌水也是任何通货膨胀政策的一般性定义。于是，自咸丰朝铸“大小钱”始，“清代多年的标准制钱制度被破坏，光绪、宣统再铸铜钱时，一概仿照咸丰小钱，不再铸祖宗制钱，而此时铜钱作为货币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大钱小钱均已无足轻重了”^②。结果，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环境下，“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格局，进而演化成了以钱来剥削百姓，以银来“怀柔万邦”。

2. 华币与洋币并行

中国的白银进口史，须从两个不同的概念来认识：银两的进口与银币的进口。这两类不同的“银”的进口，对中国的影响大不相同。《盛世危言》“铸银”篇起首一句，“洋银之入中国，自乾隆间始”，这里的“洋银”说的是外国银铸币，而非外国银两。明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后自墨西哥、日本和欧洲大量涌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是银两。到二百多年后的清乾隆年间，如郑观应所说，银两的进口逐渐为外国银元的进口所替代。至清末“宣统二年，度支部调查外国银元在中国者约计11亿元有奇”^③。另如经济学家千家驹所指出的“至清末，流入中国境内的外国银元竟达数十种之多，加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的钞票，总计清末外国货币额约占市场货币总额的55.71%，竟然超过了中国货币。”^④当时中国的市场是由外国的货币来主导的。

3. 公币与私币并行

除了外国货币占据中国市场这一可悲的局面外，中国自铸铜钱这一方面，亦日益混乱。与朝廷在制钱上的通货膨胀政策相伴随的，是私钱的泛滥。中央政府的货币铸造与发行权，不断受到地方乃至私人的侵蚀，形成了“局私、民私，充斥市场”^⑤的局面。“各省督抚视铸钱为肥缺，常任用私人，把持钱局，营私舞弊，偷铸小钱。”^⑥此等私钱，“多搀和沙子，钱质薄脆，掷地即碎”^⑦。私钱的泛滥排斥了官钱，到道光末年，“顺治、康熙、雍正三钱，铜质最精，皆已无存，即乾嘉之钱，铜质纯净者，亦不多见”^⑧。到清末时，中国市场上已形成“天下通行钱，公私各半”^⑨的局面。

以上所讲之三个“并行”，银钱并行、华洋并行、公私并行，是对晚清中国货币格局的大

①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在货币制度上较为保守谨慎。虽在全国地方设局铸钱，但均统一格式和重量，一般直径23—27厘米，重35—55克。各局铸钱均在钱背留有标记，以便查验，特别在币值上，严格规定一钱一文，偶有含铜量高，制作精美的铜钱，可以当二文使用。正因如此，清代咸丰以前的铜钱货币制度稳定可靠，与白银共同形成两大货币系统。一般整数用银，零数用钱，银钱比例也很稳定。”何玲龙、蒋东轩《咸丰大小钱》，《苍桑》1997年第6期。

② 何玲龙、蒋东轩《咸丰大小钱》，《苍桑》1997年第6期。

③ 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80页。

④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⑤ 官铸私钱，称之为“局私”；民间商人自铸者，称之为“民私”。

⑥ 胡天琼《清末币制改革述评》，《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⑦ 《清朝续文献通考·钱币考》卷十五。

⑧ 缪梓《拟改银币折钱疏稿一》，《缪武烈公遗集》卷一。

⑨ 杨象济《行钞引议》，《汲庵文存》卷三。

致概括。《盛世危言》“铸银”篇，便是以此一货币大局为背景，形成其货币理论和政策主张的。

二、斥洋银之害，吁货币独立

关于晚清中国独立和主权丧失的状况，如胡绳所描述者，“中国大门的钥匙是在外国人的荷包里（这就是说，海关为外国人掌握），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工厂，列强的兵舰和商船自由地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①。而郑观应则指出了另外一个看上去不是这般具刺激性，但却可以说是更为根本的国家独立主权丧失现象：货币独立的丧失——外国的货币自由地进出中国，自由地在中国市场流通，宣宾夺主地统治中国市场。“凡洋人履迹所至，无论通都大邑、僻壤穷乡，通用洋钱，而中国纹银反形窒碍。”^②为此，郑氏强烈地为国家的货币独立鼓与呼“自应一国有一国之宝，岂应搀用他国之宝？名不正，言不顺，以宾夺主，以伪乱真。”^③郑观应立场鲜明：即使撇开洋钱祸乱而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因素不谈，仅仅从国家主权意义上说，中国也应当自铸货币。

在强调国家主权之大原则的基础上，郑氏进一步从利弊分析的角度，把外国银币进入中国在中国市场流通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利益损失，归结为“四害”^④：

一害，“洋钱之质皆非足色”。外国铸造的银币多少都有“兑水”，“大半俱系九成，或有不足九成者”，拿到中国来“皆照银兑用，并不实核分两”。《盛世危言》问世的年代，甲午年前后，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有几十种，其中几种主要的洋钱，西班牙的“本洋”，墨西哥的“鹰洋”及英国的“英洋”，每枚皆“计重七钱二分”，若按九成算，其含银量实只有六钱半左右，但中国市场却认其为七钱二分之足银货币。由此造成了中国经济利益的“无形之折耗”。

二害，“银色既低又免进口之税”。洋人以外国银币购买中国产品，这在当时清朝的海关政策中被视为中国货物的出口，但却并非外国银币的进口，所以海关只收出口税，而不收银币的进口税。以今理看此，似乎并无大谬，货币不是货物，问题在于，此等外国银币，多数是在外国通过采矿、冶炼、铸造的生产程序而生产出的原产品，而非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周转的一般货币。外国人以银币换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以物易物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关只收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而不收银币的进口税，等于是中国的海关在实行一种鼓励外国进口、限制本国出口的颠倒的杠杆政策。“银色既低又免进口之税，以此钱购我货物不下千百万”，国家利益由此损失之巨，可以想见。

三害，“每元或抬价一二分，三四分，甚至六七分，暗中剥削，为数无穷”。含银量只有六钱半的外国银币，不但可以当七钱二分的足值白银用，而且，由于其“制作精美，使用方便”^⑤，市价还会高于七钱二，“极贵时可抵规银八钱”。如此，由六钱半到七钱二的铸造兑水，再由七钱二到八钱的市场升值，籍此两级盘剥，一枚进入中国的洋钱便可从中国经济中拿走一钱半白银的利益，正如郑氏所言，“其利之厚了然可睹”，“暗中剥削，为数无穷”。

四害，“以货售我，大都取宝银而归。彼旋得宝银，即旋铸洋钱，仍售诸我，于中取利往复无穷”^⑥。洋钱到中国市场上后所发生的两级升值（六钱半到七钱二，七钱二到八钱），为洋人创

①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② 郑观应 《盛世危言·铸银》，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1页。

③ 郑观应 《盛世危言·铸银》，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692页。

④ 郑观应 《盛世危言·铸银》，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692页。

⑤ “西方各国的银元币制较为统一，含银量一般在90%左右，……如西班牙本洋含银93.7%（后减至90.2%），墨西哥鹰洋含银90.18%，制作精美，使用方便，民间情愿以十足白银兑换成份量均不足的银元，因而市面上银元比白银抢手。在这种兑换中，中国市面流通的白银无形中又以近10%的兑率流失。”何玲龙、蒋东轩《咸丰大小钱》，《苍桑》1997年第6期。

⑥ 郑观应 《盛世危言·铸银》，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692页。

造了巨大的套利机会^①。在一枚洋钱到中国市场后便有一钱半的升值的条件下，洋人其实不必经由“以货售我，取宝银而归”的途径，而是可以直接以外国银币在中国收购白银，拿到国外再铸银币，然后再流入中国^②。如此循环套利机制吸吮了中国大量的经济利益。若按度支部11亿元流入额的统计口径算，仅外国银元一项，清代中国就有1.7亿两白银的利益外流。

于《盛世危言》“铸银”篇中所列此四害，“商战”篇中复有一个精辟的概括“更有绝大漏卮一项，则洋钱是也。彼以折色之银易我十成之货，既受暗亏，且即以钱易银，虚长洋价，换我足宝，行市变又遭明折。似此层层剥削，节节欺给，再阅百十年，中国之膏血既竭，遂成羸瘦病夫，纵有坚甲利兵，曷能驱赤身枵腹之人，而使之当前锋冒白刃哉？”^③从国际商战的角度认识银元问题，是郑观应铸银思想的核心，也应当是《盛世危言》的读者在理解郑观应铸银思想时须把握的关键。

三、劝自铸银币，倡货币统一

郑观应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不是个排外主义者。“师夷”与“制夷”，在郑观应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辩证统一体。向洋人习商战，以商战争国利，二者相辅相成，混成体系。他的这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精神，贯穿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而在其铸银思想中尤为鲜明。在“铸银”篇中，郑观应一方面指出外国银币给国家的经济利益和货币主权带来的严重损害，一方面也从外国银币身上观察到了银元较之银两在实践上的优越性。

中国传统的银两货币，不但存在与洋钱交易中的“无形之折耗”，而且，如郑氏所指出的，它本身在实际使用中也表现出严重的缺陷“纹银大者为元宝，小者为锭，或重百两，或重五十两，以至二三两，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颇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④、湘平^⑤之异，漕平^⑥、规平^⑦之殊，畸重畸轻，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⑧其实，即使是郑氏这里所说的“纹银”，也只是一个用以折算白银成色的统一的计量标准，在实践中并不存在，故而也称为“虚银两”。更有甚者，这个虚银两本身全国也不统一，上海用规元，天津用行化，汉口用洋厘。抽象的虚银两尚且不能统一，实践中的银锭和元宝更是五花八门。张家骏在其《中华币制史》中曾例举中国近代各地宝银名，“竟有24省76县市103种之多，每种名目又有不同的含银量和规定的地域性；而且，白银单位‘两’，在各地的标准也不相同，据民国初年中国银行的调查，各地运用的‘两’的标准竟有170余种，这还不包括云南滇平、广西关平与梧州的九九二平及各地自行铸造的虚银两”^⑨。磨损者要贴费，成色不一者要勘验，各地汇价差异者要加减水，计价标准不一者要折色，库平重量不一者要换算，等等，可以想见银两交易之不便。

外国银币能够打败中国传统的银两货币而取得极大的市场优势，“其故何也”？郑观应自问自答“盖洋钱大者重七钱二分，小者递减，以至一角五分。市肆可以平行，无折扣之损；囊橐

① “清朝政府发觉一方面外国银币流入，同时中国的银块则有流出，有人主张加以禁止。因为外国银币成色不过九成多一点，中国的银块是纹银，以为是十足的。中国人因为喜欢外国银币铸造得精致，所以看同纹银。外人用银币和中国的纹银等量交换，送往印度加尔各答，可以赚钱。”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41页。

② “这些被称为洋钱的西方银元流入中国，不以买货，专买银，每一银元抵换中国纹银要使用中国白银损耗二、三分。其结果是推动了外国银元向中国流入。”姚会元《中外钱币交流及西方银元流入对中国货币近代化的影响》，《福建论坛》2000年第6期。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588页。

④ 库平一两合公制37.301公分。

⑤ 湘平，清末湖南湘潭所用之平，每两约合库平八钱一分一厘七毫，合市制九钱六分八厘九毫。

⑥ 漕平，清代将东南各省的糟粮改征白银，其银两的衡量标准称漕平，每两约合库平九钱八分。

⑦ 规平，1933年前旧上海通行的银两计算法，以现银的重量加申水，以九八除之，故又称“九八规元”，与漕平标准银相比，每百两差五两五钱。

⑧ 郑观应《盛世危言·铸银》，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691页。

⑨ 张家骏《中华币制史》，转引自胡天琼《清末币制改革述评》，《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不但便于携带，更便于计数，“若洋钱则一圆有一圆之数，百圆有百圆之数，即穷乡僻壤亦不能勒价居奇，此民间所以称便也”。

银元较之银两在使用上的方便，关键在于前者是“凭个数流通”而后者则是凭成色和重量流通。“各种外国银币流到中国，起初只当银块流通。但自十九世纪初起，就凭个数流通，而不再加以秤称。”^①由“当银块流通”过渡到“凭个数流通”，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实践中，这是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上战胜中国银两的关键因素所在。凭个数流通，仅此一点便一下子消除了按“成色×重量”流通的全部技术性麻烦；理论上，这也是界定银两与银币之区别的标准——一种白银货币，是银两还是银币，其区别并不在于看它是否经过“铸造”，而是看市场是否接受其以个数流通。银元宝、银锭乃至清代各地铸造的银饼及一些仿洋钱的铸币，都不能算是真正的银币，因为它们不能按个数流通。

按个数流通的洋钱既有诸般利端，中国何不自铸之？郑氏指出了自铸银币之“四利”^②：

利一，“铸之既多，则洋钱来源自稀，足夺西人利权”。中国人喜用洋钱而不喜用银两，不是因为洋钱之“洋”，而是因为铸币在实际使用上有许多优越性，中国自铸之银币，同样也应具有这些优越性，百姓没有不用之理，久之，多之，便可将洋钱逐渐挤出中国市场。

利二，“用之既广，保财源亦崇国体”。国银铸造、发行、流通广了，因使用洋银而流失掉的利益便可逐渐得以挽回，最终可实现“自应一国有一国之宝”的货币主权原则。

利三，“银圆既非足色，鼓铸即有赢余，一切开销皆可取给于此，而无耗折之虞”。晚清中国的财政状况极为艰难，故而凡欲兴举一事，人必先虑其成本，担心国家是否能拿得出办此事的钱来。铸造货币就是生产货币，凡生产皆有成本，中国自铸银币，经费安出？对此，郑氏答曰：“或谓‘自行铸造经费过多。’不知每元所加银水其利已厚，且外洋铸银尚有铜质搀和，以此项余利移作制造之费，已绰有余裕。是所昂之价即所溢之利也。”自铸银币，无本有利。

利四，“分量之高低一律，价值之贵贱从同”。铸币因为是机器制造，批量生产，故而可以保证重量、成色的一律，从而可以消除银两货币的诸多弊病，而收“便商民”“维市面”之效。

如此，郑氏设问曰“既有此四利，而又可除彼四害，亦何惮而不行乎？”

四、谋国家利权，献铸银之策

银元既有诸多利端，而国人用洋钱，利归洋人，若行自铸，则利归于我。阐明洋钱之害与自铸银元之利，郑氏进而就铸银之具体实施方略，作了具体设计，统有六策^③：

其策一，进口外国机器，铸造中国银元。

晚清时期国外的银币铸造技术已颇先进，铸造机器已很发达，中国若自铸银币，可以从国外引进现成的机器，而不必自行研发，徒耗时财。郑观应为此作了详细的调查，而介绍了国外几种效率极高的铸币机器“美国铸银钱之法，由熔化而鼓铸，范围、淘洗、印花、鑿印，计大者每分时可成八十枚，小者每分时可成一百二十枚。”又“香港、东洋日铸大银钱万元之机器，如分铸五角或一角或五分者，每日可铸五万枚，应用机器共三十余种，运抵上海约值银二万余两”。洋机器生产效率高，经济效益亦高，美国的铸币机，按其每小时五千元的速率计算，“每元必有数分之利，即每十元必有数钱之利，由此类推，其利息之厚，为何如也”？日本的“日铸万元”之机器，每日“可净余银一百七十元，利亦可谓厚矣”！所以，中国若要自铸银币，技术上没有什么难题，进口而已。

其策二，仿宝泉局例，央督省办。

中国虽是世界上铸造货币最早的国家^④，但三千年来至晚清，中国所铸的货币多为铜币，间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44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铸银》，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692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铸银》，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694—695页。

④ “中国的铸造货币起源是世界上最早的。”袁水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之最》，《西安金融》2003年第9期。

或有铁币甚至铅币，基本未铸过银币^①。然而中国几千年的铜币铸造史，特别是清朝立国后建立的“宝泉局”“宝源局”两大造币厂，在生产与管理上已累积有现成的经验，可作为中国自铸银币的体制基础。《盛世危言》“铸银”篇中所说的“中国铸银须仿宝泉局事例”，说的就是要借鉴中国在铸铜币上已有的现成的管理体制，而不必另辟新路。而“宝泉局事例”的要旨，是央督省办，“由户部设一总局，惟核收而不铸造，分饬各省督抚，拣派廉洁精于会计之大员，专司鼓铸银钱之事”。

其策三，成色一律，一体通行。

郑观应把外国铸币之成功的经验，归纳为根本性的两点，“成色一律”与“一体通行”^②。成色一律者，枚枚等值，不增不减，长铸不变；一体通行者，既由官家铸造，自应由朝廷法定流通，官民共持，税饷通行。郑观应主张中国自铸银币，不是要为中国的货币万花筒中再加一种，而是要以此一种来驱除百种，实现国家的货币统一。在十四卷本的“铸银”篇中，郑氏特意增加了一段有关成色一律一体通行之“西例”的介绍“凡铸洋银，当道必奏请朝廷颁示天下，无论官商，发粮纳饷，一体通行。如化学师当众熔化铸造之银，有成色不符定章，重数不足者，例必严办。今湖北所铸之洋银，本地官、商亦不通用，因当道未能悉照西法办理也。”

成色一律与一体通行之间存在一个辩证关系：一体通行是目的，成色一律是条件；自铸银币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货币实现一体通行，而只有做到成色一律，才有可能一体通行。郑观应为此而举例说“道光中，言官陈洋钱之害，廷旨饬筹平准之法。时候官林文忠公巡抚江苏，见民间洋价日增，遂铸七钱三分银饼以代之。初亦便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美意良法，废而不行，可为太息！”

为此，郑氏之“设计”，集中在“成色一律”上：

首先强调一点，“成色必有定准，毋许任意低昂，犯者重惩不贷”。

问题是，“日日鼓铸，累万盈千，苟不验明，何以杜伪？”郑氏对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所给出的解决办法是，“铸成后由督抚躬亲考验，随意抽提千、百元送户部总局核实验”^③。

更有详细者，“户部宜设铁柜一具，凡各省呈缴样钱，严加封锁，填明年、月、日、时，以备核实验。验明一律，然后监铸官从优保奖，准令颁行，可缴钱粮，可作捐款”^④。

如此，则“官法严于上，民信孚于下，则市肆流通可翘足待”。

其策四，七钱二分，丝毫不异。

中国要自铸银元，所铸之币的重量应是多少？郑观应观点很明确“必须限定七钱二分，与洋钱丝毫不异，其余半元、二角、一角、五分亦须与彼从同，方可通行抵制。”为什么必须“与洋钱丝毫不异”“方可通行抵制”？为什么不能高点或低点？此问题的答案中其实包含着货币理论上的大道理，而郑氏此一“丝毫不异”的主张，恰恰反映了他对货币问题的此一方面已有了相当深的理解。欲达以国银逐洋银的效果，自铸银元的含银成色应高于还是低于“敌钱”？从直观上看，似乎应当使自铸银元的成色高于洋钱，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信誉、取得民心、占领市场，从而收居高临下、以优逐劣之效。然而货币竞争的客观法则实际上与此一直观上的道理截然相反，即经济学所谓的“劣币驱除良币”之定律：当两种货币同价不同质（值）时，人们会把其中的高质货币储藏起来，而只把劣币抛入市场。因此，若使自铸之银元的质量（成色）高于洋银，结果将是中国自铸之银元会迅速渗透流失到各家各户的储藏罐中，而留在市场上流通的将仍

① “中国自西汉的白金以后，只有金人铸过承安宝货的银币。历代铸有金银钱，这种金银钱清代也有铸造使用，但不能算是真正的货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44页。另，“光绪八年（1882年）吉林曾有机器试铸银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31页。

② “西人好利而守信，又有化学师监造，故成色一律。”郑观应《盛世危言·铸银》，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693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铸银》，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694页。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铸银》，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694页。

是洋银。此一原理在当时即有了实例证明。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自铸银元，以图抵制外国银元。所铸之“龙洋”每元重库平七钱三分，比其时通行的墨西哥鹰洋重一分。龙洋铸得也很好，且由政府下令作为法定货币使用，完税纳粮，皆可通用。原本想以此取得竞争优势，以优压劣，达到驱除洋银之目的。结果却相反，因其太好，反而被鹰洋驱逐^①。郑观应显然是明白“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故而他没有犯张之洞的错误，没有说“以优胜劣”一类的外行话。

那么，既有劣币驱逐良币之理，是否应当反过来使自铸之国银的成色略低于洋银呢？例如，七钱一分？也不行。因为，一种新货币要进入市场为民众所接受，它需要建立信誉，而一种金属铸币要建立市场信誉，成色是基础。若民众自始便知此币乃一劣币，则人们一开始就很难接受它。须知，市场上实际上有两股力在角逐，一种是买方力，一种是卖方力。劣币驱逐良币的道理，说的其实只是买方力一侧的道理：买东西的人都想把劣币花出去^②。而卖方力的道理则相反：卖东西的人都想收良币而不愿收劣币。因此，如果中国政府一开始投入市场的自铸银币就比洋银成色低，则自铸银元运动就可能因受到卖方力的抵抗而失败。

所以，综合买方力与卖方力两个因素，郑观应提出了“七钱二分、丝毫不异”的主张。这一主张，看似不偏不倚、平庸无奇，实则很不简单。仅从此一点便可知，郑观应对货币问题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

其策五，洋钱进口，皆作九成。

在成色上与洋银“丝毫不异”的基础上，郑观应在其铸银设计体系中，又加上了另一个重要的条件：“（应）参用泰西之法，他国金、银各钱入口，皆作九成，不得与自造者一律通行，此万国之公例也。”外国钱进口本国，必须减成计值，各国皆然，中国当然也应当师法之——此可谓“师夷之公理以制夷”。国银洋银虽需成色一律，但市价却应有别，“中国若仿行此法，则自造之银日见畅行，外来之洋不禁自绝。”

为什么如此一来就洋银会“不禁自绝”？郑氏未尽陈，笔者试解之。道理其实很简单，国银洋银同样的七钱二分成色，若是国银仍实以七钱二足值进入交易，而洋银却只能依法被迫以六钱五的身价入市，那么，就买方而言，消费者（或采购者）宁愿把洋银存起来，也不会愿意把七钱二成色的洋银当六钱半花，市场上以洋银为支付的交易自然会因此而减少；就卖方而言，商人们当然愿意收此“便宜钱”，但一旦收进来，则他们一定不愿将此等便宜钱仍复以便宜价付出，于是洋银便会在商人手里形成一个只进不出的机制。洋银之流通货币的角色会因此而迟滞转化为宝藏货币。伴随着洋银在中国的“宝藏化”，一个套利机制将会创造出来：人们会在中国市场上以略高于六钱五的价格大量收购洋银，熔化鼓铸成国银后，再以七钱二售出（这个套利机会很有可能被中国政府抢去，因为，它手里有一个优势：国银铸造权）。这个套利机制，将作为一个有力的“经济杀虫剂”，最终把中国市场上的洋银收购、熔铸、杀灭净尽。

与此同时，前述那个被郑观应列为洋钱之四害之一的套利机制，即以外国九成之银币购我国足值之纹银，“旋得宝银，即旋铸洋钱，仍售诸我，于中取利往复无穷”的机制，将被截断。若按郑观应的设计，嗣后洋银入口，既不能以高于七钱二也不能以等于七钱二而只能以九成于七钱二即六钱五的价格在中国使用，如此，原来洋人“以钱易银，虚长洋价，换我足宝”的套利机会自然消失。

从国银洋银“成色无异”的思想中，我们理解到的是郑观应在学术上对货币理论和货币实践的认识深度，而加上了“洋钱进口皆作九成”一条，他的整个货币思想体系中反映出来的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以国银逐洋钱”的商战精神，就锋芒可见了。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48页。

^② 只是因为在一市场条件下，买方力是大于卖方力的，所以才有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

其策六，禁用外币，国立大统。

在十四卷本《盛世危言》“铸银”篇中，郑氏以加括号的形式附上了这样一段话“泰西各国皆用本国之银，如俄用卢布，法用马克，德、奥用福禄林^①，英用喜林，美国用打拉，外国银钱不许通用。”这句话，反映的是郑观应货币政策主张的最高境界，即，中国货币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应是货币独立，禁用外币，收回货币主权。先以“成色无异”之标准铸造国银，再辅以“洋钱进口皆作九成”之规则，二策结合，先立后破，剿灭洋钱。洋钱既灭，即明正律法，实行货币的国产化和国家化。

郑观应为国家献上的上述六个方面的铸银之策，是一套严肃认真的设计体系。就设计本身而言，应当说基本正确合理。

人们可能对“策二”之“央督省办”的设计产生疑问。为什么是“央督省办”而不是中央统办？统由中央政府来做，不是更有利于货币统一，更有利于达到“成色一律，一体通行”的效果吗？这一在今天纸币时代的人看来不能不问的问题，在当时却可能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生活在贵金属货币时代的人都能理解到这样一层：运输成本。白银铸造之不同于纸币印制，运输成本之差异为其一。生银向铸造厂的运送以及铸成的银币再回流，构成两级运输，若全国仅设单一之中央铸币厂，以诺大之中国，运输成本将非常之巨。而央督省办，会大大节约此类成本^②。

然而事情有利便有弊，规避了运输成本，便产生了另一块成本：中央对地方的监管成本。“督抚躬亲考验”，“随意抽提”，能做得吗？如何能够保证督抚们在抽提时一定是站在中央而不是地方的立场上？怎么能够防止户部铁柜里收上来的都是些专门生产的“送验品”而不是随机样品？货币统一的基础是铸造统一，而在清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环境下靠“央督省办”体制去实施铸造统一，有着相当的空想性。后来的历史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从张之洞在两广尝试铸造银元起，“由于铸造银元有利可图，各省就纷纷仿行。各省龙洋不能保证重量和成色的一致，并在银元上铸有省名，这又造成了市价的不一和银元流通的地方性”^③。“成色一律，一体流通”终成空话；此话一落空，“自铸银币以逐洋钱”的设计也便当然落空——直到清末，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着的银元，仍以洋钱为主。

另外，“策五”所提出之“洋钱进口，皆作九成”以及“策六”所提之“禁用外币”之政策主张，落实起来皆要依赖于清廷之法令的严肃性与有效性。中国政府的法令在洋商面前真能令行禁止吗？中国政府立法规定洋银进口“皆作九成”，洋银就真能皆作九成吗？中国政府下令禁止市场使用洋钱，市场上的洋钱就会消失了吗？只要端出“国际公理”来，洋人就无话可说了吗？果真如此，中国还叫“半殖民地”吗？时人恐怕皆明此理，故而除郑观应外，持此议者不多，此议也从未成为中国的政策。整个中国半殖民地时代通行的唯一公理就是“强权即公理”，对此，腐败无能的满清朝廷自有其自知之明。

结 语

晚清主张自铸银币者，并非郑氏一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等即向朝廷提出“设官局，自铸银元，以抑制洋钱的主张”^④。嗣后随着洋钱的愈加泛滥和中国货币格局的日益混乱，持此主张的人士益多，形成了主流，而郑观应则可以说是其设计上的集大成者。以今天的标准看，郑观应算不上是经济学家或货币学家，然而彼时中国对此事插嘴的各路名流们，又有谁能算得上是经济学家或货币学家？何况，即使当时“文明世界”里的货币理论本身，以今天的眼

① 此处郑氏似有误，似应为“法用福禄林，德奥用马克”。

② “（光绪）九年慈禧叫当局买洋铜交机器局铸钱，户部称不便，乃叫李鸿章在天津铸。”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31页。

③ 冯郁《近代中国货币的统一进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④ 冯郁《近代中国货币的统一进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光看来，也是流于肤浅的。当一班将相督抚在所上奏折中推动朝廷设局铸银时，当各方士绅名流在言谈话语中呼吁中国自铸银币时，也许只有郑观应，在自己大部头的思想专著中对银元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国家自铸银币的政策作出了系统的设计。

光绪十三年张之洞首铸“龙洋”，思想首结实践果实。到世纪之交《盛世危言》八卷本问世时，武昌和天津也先后成立了官办造币厂，鼓铸银币；嗣后各省纷纷仿行。可叹的是，国铸银元的出现，既没有将洋钱驱逐出去实现货币独立，也没有以一币代百币实现货币统一，而只是为彼时中国的货币万花筒中再添上了一种而已。直到清朝灭亡，洋钱在市场上的数量始终居于主导地位^①。进入民国后，从1914年发行的“袁大头”，到1933年“废两改元”后的“船洋”，中国自铸的银元才开始成为中国市场的主币，货币统一的努力才初见成效。而真正的货币独立和统一，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一百多年，时过境迁，从中国当今的货币制度和货币体系中，已经完全看不到百年前的痕迹了。彼时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着的那几十种货币，鹰洋与龙洋、铜板与银两、私票与洋钞，等等，已被历史扫荡净尽。四十几年前西方货币史上发生的那场制度大断裂^②，把人类的货币史截分成了贵金属时代与纸币时代。断成的两截之间形成的鸿沟，不但成为了人类货币制度无法再走回头路的实践障碍，而且也成了两截之间互相理解的思想障碍，甚至，如今的“货币”与当年的“货币”，已经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和一个概念了。郑观应铸银思想乃至其整个货币思想，在纯技术意义上可以说已经“过时”，然而，在他的这些“技术性”思想中凝结着的哲学精神，那种以国为本的精神，那种追求国家货币统一和货币独立的精神，则对于后世的中华民族在处理自己的货币问题时，有着永恒的学习价值。历史没有忘记郑观应，是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仍存在着一些让我们不能不时忆起他的现实问题。

(责任编辑：陈炜祺)

A Monetary Design in the Reform Outline: Exploring the Chapter “Coining Silver” of the Book “Warnings to the Prosperous Age”

Wang Wuyi

Abstract: Zheng Guanying's well known book “Warnings to the Prosperous Age” sets a particular chapter “Coining Silver” discussing the topic of China's monetary independence in Late Qing Dynasty. Foreign silver dollars floods in China's market and harms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Coining China's own silver dollars would benefit China much. Based on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the chapter raises an opinion that China should coin silver dollars of, by and for its own. Furthermore, he systematically and structurally depicts a practical policy design for Qing dynamic government to carry on his proposition. Zheng's silver coining thought at that tim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an academic guidance and an encouragement force to the public opinion. This paper integrates, analyzes and interprets Zheng's coining silver thought and indicates its modern value and utilitarian significance. It is the only research work so far in the world about Zheng's coining silver thought.

Keywords: Zheng Guanying “Warnings to the Prosperous Age”; Money of Late Qing Dynasty; Silver; Silver Dollar

① “清末国内流通的自铸银元只有2亿元，而外国银元为5亿元，远远超过自铸的银元。外国银元在当时所有货币中所占的份额达23.84%，在当时纷杂的货币中比例最大。”习永凯《近代中国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影响（1880—1935）》，河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35页。

② 此处指西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